



重庆赴法留学运动 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萌芽

□ 陈钰玲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从北平飘到了远在西南的川渝。6月,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第一批赴法青年取道重庆,乘船出发。重庆各界人士涌向码头,夹道欢送,这热闹的场景让重庆总商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深受触动,决定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分会成立后,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学制一年,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其目的是帮助重庆地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初步掌握法语知识,为出国提供便利条件。学校招生对象为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经考试后录取110名学生,其中便有来自四川广安的李希贤(小平)。

学校条件简陋,但同学们学习认真,在掌握吸收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据《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记载,为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这群学生曾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在那里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

1920年7月,经过一年的学习,有83名学生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及法国驻渝领事馆的口语、体格检查,取得赴法资格。在他们之中,戴坤忠、冉钧、谢陈常、邓绍圣等46人取得自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解决到法的三百元路费,而邓小平、傅汝霖、周贡植、陈家齐等37人取得自费生资格,需自行凑足路费。关于邓小平留法路费来源,还有一些争议。许多人认为是汪云松资助的,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显示,邓小平留法的路费应该是由其父亲邓绍昌筹措支付的。

1920年8月27日,84名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整队出发,经太平门出城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客轮渝东

下,8天后到达上海。9月1日,同学们乘上法国二等邮船“哥特莱蓬”号赴法,经过几番辗转,最终抵达法国马赛。

除在预备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赴法外,也有许多直接由重庆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1919年夏,江津中学的聂荣臻等20多名江津学生通过重庆《商务日报》编辑、江津人刘颖滨商请会长汪云松出面,取得法国驻渝领事同意,办理了出国护照。他们与巴县、长寿、涪陵、南充等县赴法的学生共35人一起乘船东下。同年12月,众人乘法商“凤凰”号邮船赴法,1920年1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9年至1921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共有15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四川籍学生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在册者达472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首。而重庆籍学生(包括直接由渝赴法者)就有150人左右,约占四川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江津、巴县两县籍学生有90人(巴县47人、江津县43人),居全川首位。

勤工俭学学生赴法,正是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经华法教育会联系,学生们到法后很快被分到工厂工作和进学校补习。来自四川的不少人进入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等地做散工、杂工,大多干的是体力活或很脏的粗活,做技术工的人很少。如赵世炎在施莱德工厂作杂工,陈毅在巴黎克里西门外克卢伯公司的下层炮厂当钳工,邓小平在斯莱达钢铁厂拣过废铁,又在沙万蒂橡胶厂修过胶鞋。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饭大家一起做,一起做,生活得极省。陈毅在谈到他旅法勤工俭学的感受时说,“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

有发展的余地,常感到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他对被资本家辞退而失业的法国工人深表同情,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如果说工厂艰苦的生活让这批学子对无产阶级的遭遇深深同情,那么1921年法国陷入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面对失学的无助、生活无法保障的困境,“学以救国”的梦想破灭后,他们终于一步步靠近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次次争取权益的斗争中逐渐坚定了自身的理想信念。

1921年初,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成立了“工学互助社”,团结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期间,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留法学生开展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三大运动以留法学生的失败告终,陈毅、周钦岳等34名川渝学生被法国当局以非法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罪名”遣送回国。虽然运动失败,但也进一步激发了众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热情。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团体,如“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会”等。其中,赵世炎于1921年春与周恩来等人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这些组织的兴起为后期中国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壮大积累了一定经验,培养了优秀人才。

同年冬,赵世炎与周恩来等人发起建立新的统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1922年6月3日至5日,赵世

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决定加入1922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并将名称改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是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为《赤光》)。《赤光》问世就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努力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及华工中组织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邓小平撰写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揭露一些旅欧反动文人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争取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支持,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谋求改造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人中有的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斗争,在旅欧华侨、学生、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则选择了回国,有的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将领,拼杀在战场守卫家园;有的选择兴干实业,救国救民;有的潜心科学,助力祖国强大……那一艘艘载着希望与憧憬而去的轮船最终带回了一个个热血沸腾、信念坚定的新青年。聂荣臻曾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人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 缪士毅

谚语话清明

我国的清明节,在每年的4月5日前后,它既指节气,又指节日,自古深得人们重视。

清明,夏代已有,原指大禹治水后既清且明,天下太平。汉时成为节令之一,古称“三月节”,表示天气清明,万物滋生。汉代《淮南子·天文训》说:“春风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在漫长的岁月中,清明节逐渐形成了不少与气候和农事有关的谚语,尽管谚语受地域限制,物候等因素影响,但都是劳动人民实践的总结,虽朴实无华,却别具韵味。

清明谚语,有的反映清明时节的阴晴雨雪等,对未来天气走向的影响,如“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清明无雨早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阴雨下了清明前,断断续续三个月”“清明有霜梅雨少”“清明无雨少黄梅”“雨打清明节,干到夏至节”“清明有雾,夏秋有雨”“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清明要晴,谷雨要淋”“清明刮了坟头土,沥沥拉拉四十五”。这些清明谚语通俗自然,明白如话,是人们在长期生活生产的实践中,通过不断观察气象得出的经验总结,对清明之后的天气情况有一定的预示作用,比如“清明刮了坟头土,沥沥拉拉四十五”,意思就是,清明节如果刮风,接下来下雨时间就会比较长。当然,天气本来就是风云变幻的,但人们从生产实践中通过谚语把握天气一个大致的走向,也足见其不凡的智慧。

我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劳动人民历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耕作,其中清明节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事节点,与农耕更是紧密相连,这在清明谚语中可见一斑。如清明谚语,或提醒人们趁此种瓜种豆,如“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种瓜,立夏开花”“清明种瓜,船装车拉”;或催促人们抓紧耕田播种,如“清明谷雨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播种不过清明关,移栽不过立夏关”“二月清明不用慌,三月清明早下秧”“清明前,开秧田”,等等,这些清明谚语是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农事经验,贴近自然,至今仍每每为人们所引用,告诉人们要不误农事,力争丰产丰收。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认识到清明天气情况对日后农作物收成的影响,并将其反映在清明谚语之中,如“清明前后怕晚霜,无晴无风要提防”“麦怕清明霜,谷怕后来雨”“清明风若从南起,预报田禾大有收”“清明前后雨纷纷,麦子一定好收成”“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雨洒清明节,麦子豌豆满地结”“清明前后一场雨,豌豆麦子中了举”“清明雨,损百果”“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等等。这些谚语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清明天气对日后农作物丰欠的影响,语出自然,通俗易懂,显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大溪文化“空心陶响球”,是玩具吗?

□ 蒋华



《古诗源》卷一记载《弹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穴(rou肉,这里指飞禽走兽)。”这首古代民歌可谓历史悠远,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古人狩猎生活的古老二言诗,意思为:“去砍伐野竹,连接起来制成弓;打出泥弹,捕获猎物。”歌中的“土”,是指泥弹。

笔者不由思考:团泥成丸,火烤为弹,那不就是陶球或陶弹丸吗?球形,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几何体之一,日、月即为球形。新石器时代,史前先民们已经开始把球作为生产、劳动的工具。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在不同史前文化遗址中分别发现有许多陶球、陶弹丸,其中大多数为实心陶球,也有个别是空心陶响球。古人在绳索两端各绑上一个球,做成的“飞石索”可以

用于狩猎。《弹歌》中的“飞土”,想来其中应该有陶弹丸的身影。

大溪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流域,距今约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的一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因为最早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在大溪文化众多遗址中,出土有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空心陶响球,譬如重庆巫山大溪、湖北宜昌清水滩、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等地遗址中均有陶响球出土。显而易见,陶响球在大溪文化时期极为盛行。

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先后出土十余枚以上的史前陶球,其中就有一枚异常精美的空心陶响球。其直径5.4厘米,泥制红陶,上下左右六方各有等距离圆形小孔相对称,小孔间

由篦点纹构成菱形图案花纹。陶球内部中空,内存有砂砾制作的籽粒,轻轻摇动会发出声响。制作如此精美的陶响球,想来绝不会是作陶弹丸使用,应该另有用途。

玩,是人的天性。玩具的历史,其实和人类的历史一般长,甚至比人类的进化史还长。陶响球应该是人类玩具里的老前辈,球体内部中空,里面装着小石头或者砂砾,摇动的时候沙沙作响,以此刺激和锻炼婴儿的听觉和视觉。它作为来自远古时代最早的摇铃玩具,至少有五千年历史了。

在这一枚小小的空心陶响球上,亘越古今数千载光阴来到我们面前,上面汇聚的却是空母对子女的关爱,这份爱从不曾改变啊。

《重庆母城建筑口述丛书》 第一辑出版发行

近日,由渝中区政协组织编写,致敬那些承载重庆母城人文历史经典建筑的《重庆母城建筑口述丛书》第一辑——《经典越千年——重庆地标的述说》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全书约38万字,图片300余幅。

该书着重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为线索,选取母城南宋老鼓楼南署遗址、重庆湖广会馆、人民解放纪念碑(暨抗战胜利纪功碑)、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等九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建筑入书,口述者为专家学者,或为当时分管工作的领导干部,都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经历。他们提供的口述史料,带给我们不少鲜为人知的鲜活故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母城建筑来龙去脉的感知,增加了我们对故乡深切的挚爱。(陶祥飞)



□ 张义霖

“民生”另一大功臣——郑东琴

1925年成立的民生公司,无疑是中国实业界的一面旗帜。现在,每当人们谈起民生公司,首先想到的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想到的是被称为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其实,“民生”功臣除了卢作孚,还有一位不能忘记,他就是——郑东琴!

郑东琴,名贤书,重庆永川人,生于1882年10月,幼年家贫,勤奋好学,曾就读于永川达用学堂。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东斌学校;1906年,在日本与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参加同盟会。

郑东琴在东京参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后回国,于1907年7月执教上海中国公学,任监学。随后与熊克武、黄树中等被派回四川,加强革命力量。后来又回到永川组织“教育会”并担任会长,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2月至1910年10月,郑东琴在成都法政学堂任教。重庆蜀军政府成立,郑东琴任资州知州。嗣后又任彰明县、大邑县征收局局长,重庆警察厅厅长,合川、涪陵、岳池、广安、南充、巴县等县知事。郑东琴在广安首倡义学,绅耆为他设宴祝寿,他避而

不受,深受人民爱戴。合川人曾为郑东琴《去思碑》。郑东琴组织编写的《合川县志》和《巴县志》是珍贵的地方史志,至今仍受好评。

郑东琴与“民生”

1925年10月,合川人卢作孚发起组织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但持观望态度的人居多,真正认股者极少。为此,卢作孚亲自前往重庆找老上级郑东琴求助(郑东琴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时曾邀卢作孚一同共事)。郑东琴当即借出数千元,同时出面说服合川县府予以支持,其中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从县教育局中借出大洋8000元。与此同时,鉴于合川当时是川军第二十八军第3师师长陈鼎勋的防区,郑东琴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争取到了陈鼎勋的支持和投资。这样,条件逐一成熟,“民生”轮从上海顺利开回。

1926年8月,民生公司正式开业,“民生”轮行驶渝合线,营业兴旺。不久,时序进入冬季,江水枯涸,即将停航。卢作孚找郑东琴商量,决定增辟涪涪线。郑东琴利用自己早年任过涪陵县

知事的人脉资源,积极出面协调,得到涪陵人士的大力支持。

1927年1月,“民生”轮开始航行涪涪线,整个枯水季节营业甚佳。这年夏,民生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郑东琴被选为监察,同卢作孚等决定把上年8—12月的股息2分5厘发给股东,股东们非常高兴。郑东琴趁机向股东大会提出增资建议,获得通过。这次实际增资73000元,超过原定增股额46%。有了这笔增资款,民生公司随即在上海建造新轮,取名“民用”。“民用”轮比“民生”轮吃水浅,船身稍大,能全年通航渝合线。从此,民生公司的经济收入更为可观。

1928年,顺庆商人谭谦禄(又名谭谦六)在上海新造的“顺庆”轮在开回重庆的途中被川军范绍增部扣押,并由该部派员直接控制了该轮船。郑东琴曾经在顺庆作过知县,与谭谦禄相识,受托为其转圜,事情得以解决,于是成立了以郑东琴为董事长的长江轮船公司,将“顺庆”轮改为“长江”轮。谭谦禄不谙经营,民生公司抓住机会进行投资,取得该公司的经营权,加入渝涪线,由此民生公司从当年夏开始有轮船航行重庆叙

府嘉定间。1929年10月18日,民生公司正式接收“长江”轮,并将其改名为“民望”轮。

1930年2月,民生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此次股东大会决定将公司资本增加为30万元(当年实收25万元),公推郑东琴为董事长。自此,郑东琴一直担任该职直至解放,在民生公司的发展中给予卢作孚极大的支持。卢作孚曾经称赞郑东琴“老成持重,支持公司主张”。

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民生公司濒临破产。宋子文为解决民生公司经济困难为诱饵,要求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对此坚决抵制,并亲自出面奔走,解决资金问题,使民生公司转危为安。后来,又成立太平洋轮船公司,在台湾、香港均设有民生分公司,发展沿海航运事业。1949年9月,国民党蓄意毁掉山城,阻挡全国解放,郑东琴当机立断,派出火轮将炸弹200多吨、汽油数千桶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全部运离重庆,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保持晚节 魂归故里

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有人曾劝郑东琴避居香

港,将民生公司的黄金、美钞和新轮转移。郑东琴出于爱国之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坚决不为所动。

重庆解放,郑东琴代表重庆市工商业界并以共产党的老朋友身份,欢迎解放军入城。邓小平、刘伯承、吴玉章等第一次在重庆皇后餐厅宴请重庆市各界爱国人士及社会贤达,特邀郑东琴出席。1950年3月18日,在卢作孚滞留香港的情况下,郑东琴出面约请在重庆和合川的董事、监察人或其他代表,在重庆民生大楼召开第二十四届第一次董监座谈会,阐述正义主张,通过“请政府速将代表中国、交通两行及许多官僚资本的董监派定”等意见,让民生公司投入到新生的共和国怀抱。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郑东琴被任命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郑东琴以民革、民建成员双重身份,除担任民生公司副董事长外,还兼任重庆市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及重庆市人大代表、四川省及重庆市政协委员。晚年的郑东琴把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作为书斋,除了看书和会见熊克武、但懋辛等老朋友外,还潜心研究地方志。据说他精心搜集的州县志有100多种,在重庆颇具影响。

郑东琴一生勤劳俭朴、廉洁自律,常教育儿孙要洁身自好、自立、自强,生前没有安排一个儿孙到民生公司工作。1965年7月5日,郑东琴因病逝世,享年83岁。其后人遵照郑东琴生前愿望,于2011年将其骨灰迁葬于永川白塔陵园,并于墓园中树郑东琴纪念雕塑一座,让其魂归故里,长眠家乡。